

戴逸文集

乾隆帝及其时代

戴遂文集

乾隆帝及其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乾隆帝及其时代/戴逸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1

(戴逸文集)

ISBN 978-7-300-25200-1

I. 乾… II. 戴… III. ①乾隆帝(1711—1799)-人物研究②中国历史-清代
IV. K827=49②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2213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戴逸文集

乾隆帝及其时代

Qianlongdi Ji Qi Shida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8.25 插页 2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6 000

定 价 94.00 元

前　　言

这不是一本乾隆帝的传记，也不是关于 18 世纪中国史的全面叙述，只是我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所思所得的零散杂乱的记录。18 世纪是伟大的时代，无论对于中国或世界都非常重要。中国适当康雍乾盛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封建社会攀登到了峰巔，但这不等于说资本主义就在眼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曾创造和发展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它将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而不会按照西欧历史的模式，亦步亦趋。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明，各有自己的道路、自身的价值。如果没有外国的入侵，中国将循自己的道路继续行进下去。历史会在何时转轨？怎样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很难作出判断。可能是经历漫长的演变，而且会和西欧国家的过渡方式截然不同。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很多光辉灿烂、对今天仍然十分珍贵、十分有用的东西，我们要珍惜它。也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生活、阻碍进步的东西，克服它、淘汰它，要有必需的条件、充分的时间和许多世代的努力。研究 18 世纪的历史常常会涉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遐想，现实是历史的延伸。研究 18 世纪的中国是认识近代和今天的途径之一。迄今为止，历史学界对于 18 世纪中国的研究还很不够，我这本书仅是非常粗浅而零散的探索与尝试，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一大片肥沃而辽阔的处女地有待历史学家们去开垦、耕耘。只要投入力量，必将得到报偿。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总会加深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认识，总会增进智慧、加强力量，使我们满怀信心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家庭和读书时代	37
第一节 仁慈的祖父	37
第二节 严酷的父亲	42
第三节 生母之谜	50
第四节 兄弟情谊	57
第五节 理学名师	68
第六节 同窗知己	74
第七节 读书生活	80
第八节 田猎、娱乐和其他	88
第三章 政治	94
第一节 宽严相济	94
第二节 从秋朝审勾决看政策演变	110
第三节 在官僚政治的旋涡中	115
第四节 人才观与驾驭术	133
第五节 皇后之丧的政治风波	140
第四章 军事	152
第一节 瞻对之役和第一次金川战争	152
第二节 初平准噶尔部	164
第三节 再平准噶尔部	180
第四节 平定回部	197
第五节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213
第五章 经济	229
第一节 以农为本	229

2 乾隆帝及其时代

第二节 推广高产作物和种植经济作物	239
第三节 全国耕地数估测	248
第四节 粮食产量与粮食贮备	253
第五节 人口增长和人口统计	263
第六节 水利	271
第七节 自然灾害	286
第八节 赈灾	304
第六章 文化	313
第一节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	313
第二节 御制诗	330
第七章 对外关系	347
第一节 闭关政策	347
第二节 中英关系	353
第八章 北京城市建设	369
第一节 建设概貌	369
第二节 大内和三海	376
第三节 三山五园	386
第四节 其他建筑及设施	402
第五节 圆明园与大观园	420
第九章 人物	424
第一节 福康安	424
第二节 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	434
第三节 关于香妃的传说	437

第一章 概述

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名弘历。清康熙五十年生，嘉庆四年死（1711—1799），享年88岁。他在位60年，传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庆帝），又当了三年多太上皇。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在位时间仅比祖父康熙少一年而居第二，但做太上皇时仍独揽大权，因此，他实际掌握权力的时间比所有的帝王更长。



乾清宫正殿，雍正帝的传位密诏即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乾隆帝的生父为雍正帝，生母钮祜禄氏，其母初为雍亲王府格格，后被尊为孝圣宪皇后。乾隆帝有兄弟10人，多早殇。他排行第四，为皇四子，初封和硕宝亲王。他幼即聪颖，深得祖父、父亲的宠爱。雍正即位时，定秘密建储的制度，将弘历的名字密写封缄，藏于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雍正病逝，启视传位密诏，弘历继皇帝位。1736年，改元乾隆。皇位授受之际，没有经过祖辈、父辈那样剑光刀影、惊心动魄的激烈争夺。他即位，既有雍正煌煌

遗诏的合法根据，他兄弟 10 人又大多已不在人世，继位时在世的只有两位弟弟，一位是与他同龄的五弟弘昼（封和亲王），另一位是年仅两岁的十弟弘曄（后封果亲王）。这两个人的地位、才智或年龄均不足以和弘历争逐帝位。因此，乾隆继位，顺利接班，风平浪静，没有发生政治动荡。

乾隆统治时期，清王朝国力鼎盛。当时，经济繁荣、国库充裕、社会安定、户口大增，边疆的统一得以巩固，中国的版图于此奠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荣昌盛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叩关而至，清王朝正走过了全盛的阶段，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严重危机正在日益临近。

研究乾隆帝，既要研究他的思想、行为、政策、功绩、失误，也要研究他的经历、性格、才能、爱好、心态，而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一个时代，即 18 世纪的中国。乾隆帝诞生于 18 世纪之初，逝世于 18 世纪的最后年代，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这样一个有才能、有作为、有个性的统治者，产生了一位既仁慈又残暴、既英明又短视的君主。他的思想、行动及其制定的政策是在中国 18 世纪的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甚至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环境造就了历史人物，而人物又在改变、创造环境。乾隆帝长时期站在 18 世纪的最前列，运筹帷幄，驱遣群僚，叱咤风云，在他的巨大身影下，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历史篇章。他所思、所言、所行深刻地影响着时代。在一定意义上，他是 18 世纪中国历史的参与者、领导者和塑造者。

—

乾隆帝知识广博，才能卓越，自幼聪慧。11 岁时晋谒祖父康熙帝，当面背诵书文，一字无误，得到老皇帝的欢心，被养育宫中，随侍左右。乾隆帝后来经常怀念这段经历，视为不世之恩荣。少年和青年时代受到严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得到名师福敏、蔡世远、朱轼等的教导，研经习史，作文吟诗，又酷爱书法、

图画、文物，精娴音律，热心园林建筑，全面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爱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鉴赏家的气质。通多种语言，不但精于汉文，而且熟谙满语，与大臣讨论政事，经常使用满语，还懂得蒙古语、维吾尔语与藏语，能和来朝的少数民族领袖直接交谈。他爱好体育武事，经常骑马射箭，秋狝围猎，观看冰嬉、摔跤、龙舟等。曾多年随侍皇帝左右的著名历史学家赵翼说：“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① 由于勤习武事，经常锻炼，故身体健康，精力过人，很少生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已 79 岁，朝鲜使者洪仁点觐见后，说他“尚如六十余岁人，筋力则耳目聪明，步履便捷矣”^②。

乾隆帝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 1.6 公尺（据觐见他的英国使团人员说身高五呎二



乾隆帝戎装像。



乾隆帝青年时期朝服像。

^① 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圣射》。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82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时，约 1.6 公尺）。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和慈祥。

乾隆帝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但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勤于理事，始终不懈，独揽大权，能谋有断。他即帝位时是个刚满 23 岁的青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是 24 岁）。在父丧的哀戚气氛中初登宝座，这个青年人俯视着王公百官，匍匐脚下，聆听自己的谕旨，高呼万岁，内心第一次体验到作为“天下主”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也唤起强烈的使命感。他认识到：治理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问题繁多的庞大帝国，如同进入一个充满着种种弊端、陷阱和阴谋的世界，必须小心谨慎，努力以赴，勤勉从事。他告诫自己：“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然与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① 在多年之内，工作的重担使他大大减低了生平的爱好——写诗和游景。故初年诗作较少，也不常出外巡游，整天埋头于千头万绪的棘手事务中，处理堆积如山的文牍奏折。赵翼记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形：“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② 这是平常无事的情形，如果有战事、河工、赈灾、祀典等重要政务，就更加忙碌，精力贯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准噶尔战争中，“每军书旁午，应机指示，必揭要领。或数百言，或数十言，军机大臣承旨出授司员，属草率至脱腕。或军报到以夜分，则预饬内监，虽寝必奏。迨军机大臣得信入直庐，上已披衣览毕，召聆久矣。撰拟缮写，动至一二十刻。上犹秉烛待阅，不稍假寐。”^③

^① 《御制文三集》卷九，《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

^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

^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三，《西域用兵》。

乾隆帝夙兴夜寐，孜孜求治，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尤其如此。平日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规律，“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①。他几乎每天如此，循环往复，度过时光。不仅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固定的安排，而且一年四季的行踪、起居，也有近乎不变的日程表。每年元旦诣奉先殿、堂子祭祖，至寿康宫向皇太后祝贺，御太和殿受朝，在养心殿开笔，书写心经。正月间的典礼最多，祭太庙、祈谷、宴外藩王公、宴近支宗族、宴廷臣，在重华宫吟诗联句，上元节在圆明园之“山高水长”观看烟火花灯。二月祭社稷、行耤田、开经筵。此时天气渐转暖，从大内移居圆明园，清明则谒东、西陵（遵化和易县），或逢巡幸之年，多在本月内启行。四月以后，北方春夏多旱，行雩礼以祈雨，五月端午在圆明园福海观龙舟竞渡。夏秋间，



乾隆帝岁朝行乐图。



乾隆帝观看蒙古力士表演。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892页。

多往避暑山庄，每去必住两三个月，大会蒙古王公，举行木兰秋狝。夏秋如在北京，常去清漪园、玉泉山、香山、汤山、盘山的行宫走动，有时也在南苑骑射行围。八月为乾隆寿诞，十一月为皇太后寿诞，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节庆日，张灯结彩、点景演戏，成为全国的娱乐日。十一月冬至，举行隆重的祀天大典，从此由圆明园回居大内。十二月朔日开笔写“福”字，分赐王公大臣。年底，外藩来觐，又必有络绎不绝的召见、赏赐和宴请，至于皇太后处，每隔几天必去请安问好。这一大致的日程表，岁以为常，周而复始。乾隆帝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按照编写好的剧本，扮演皇帝这一角色。当然，突发事件和皇帝个人一时兴会所至，随时可以改变日程，但一年的生活起居大致脱离不了这一刻板的程序。一个专制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他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实际上，他的行动却按着固定的节拍机械地运转着，不过这种固定节拍由传统、习惯、礼仪需要所形成，皇帝自觉自愿地接受，已变成了专制皇帝个人意志的一部分。



乾隆帝儒服写字像。

传说中把乾隆帝说成是充满奇闻逸事的风流天子。其实，他生活很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日落而止，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①。他处事很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② 和其他皇帝一

^① 《御制诗文十全集》卷四四，《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即事得句》。

^② 《御制诗五集》卷一三，《偶园》。

样，他有三宫六院许多嫔妃，却并不沉溺于女色。他和自己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富察氏感情极笃，伉俪情深，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早逝，其时乾隆年仅36岁，哀伤思念，直至晚年。他历年写了许多富有深情的悼念诗赋，其中一首说，“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事之皆虚。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①。继立乌喇那拉氏为皇后，但帝后感情不和。乾隆三



乾隆帝慧贤贵妃像。

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至杭州，因事龃龉，皇后忿恚，自剪其发，乾隆震怒，置后于别宫。翌年皇后死，乾隆帝不以皇后相待，命以皇贵妃礼仪治丧。从此之后，再也不立皇后，帝内宫虽有爱宠，但管理严格，不准胡作非为。晚年有爱妃惇妃，恃宠骄横，宫女得罪，竟被杖责致死。乾隆帝恼怒，将惇妃降革为嫔，谕旨说：“事关人命，其得罪本属不轻，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从末减耳。若就案情而论，即将伊位号摈黜，亦岂得为过当乎！”^②

乾隆帝受儒家政治哲学的熏陶，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他视君主为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③，“臣奉君、子遵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④。他也很重视儒家学说中的民本思想，认为君主有责任保护民生，关怀民瘼，重视民心，“民之所与，即天之所与，是以人君祈天永命，莫先于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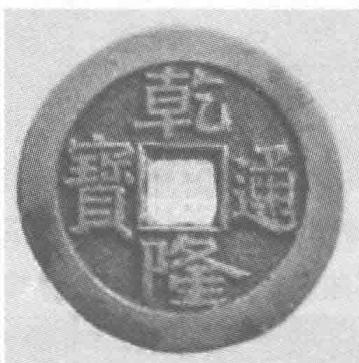
① 《御制文初集》卷二四，《述悲赋》。

② 《清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③ 《清实录》乾隆三十一年二月甲辰。

④ 《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甲申。

民。得民心则为贤而与之，失民心则为否而夺之。可不慎乎？可不惧乎？”^① 他认为：君主应养育万民，控驭万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庶民安居乐业，政权才能巩固、长存。人民的力量以被动的形式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政策中。他曾模仿李迪的《鸡雏待饲图》作画一幅，墨刻多分，赐给各省督抚们，要他们照顾百姓，就像照料饲养小鸡一样，“即雏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时时以保赤为念，遇有灾赈事务，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②。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固然促使他尽可能去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并不影响他在很多场合采取严厉的手段去镇压人民起义。



乾隆通宝。

他认为：君与民的关系如同父与子，父亲有养子教子的责任，而儿子亦有尊亲孝父的义务。不论老百姓穷困到什么程度，都不能违犯国法，反抗朝廷。否则就是“刁民”、“莠民”，就是不孝的忤逆之子，人人得而诛之，故“恤民”与“惩奸”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盖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康之淳风。”^③ 因此，他对聚众闹赈、抗租抗粮、秘密结社、武装起义竭力镇压，常责怪官吏们姑息养奸，邀誉市恩。他处治此类案件总是从重从严，近于斩尽杀绝，决不心慈手软。在这方面，充分暴露了他作为专制君主的狰狞面目。

乾隆帝统治的时间很长，晚年吏治趋于腐败，诸弊丛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反抗斗争蜂起。他禅位给儿子嘉庆帝的时候，正值湖北白莲教揭竿而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清朝统治盛极而衰。从乾隆帝个人来说，进入老年，理政不如早年之勤劳，用

^① 《御制文二集》卷三六，《读韩愈对禹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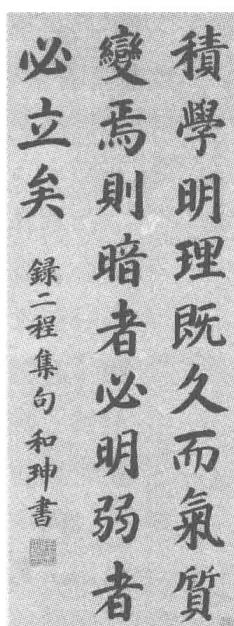
^② 《清实录》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己亥。

^③ 《清实录》乾隆八年十月乙亥。

人不如早年之明察，办事不如早年之决断，体力渐衰，精神不支。而一切军国要务仍要由他一人决断，习惯站在权力巅峰的君主不会因自己精力的衰退而让出权力，甚至禅位以后，乾隆仍是实际的统治者，嘉庆仅仅是名义上的皇帝，新皇帝很识趣，“自丙辰（嘉庆元年）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王爷处分，朕何敢与焉’”^①。老皇帝掌握实权，但管不了事，新皇帝又不敢管事，正因为如此，和珅得以狐假虎威，窃取权力，擅作威福。



嘉庆帝朝服像。



和珅书法。

任何专制统治者，当他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到了晚年，日益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他的知识、经验非常丰富，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反应模式，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思想和性格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青年时代的许多优点日益向其反面转化，顽强变成顽固，自信变成自傲，严格变成严苛，道德上的正当要求变成僵化的清规戒律。甚至心理失常，行为怪僻，出人意料。人们既不能理解他，又不敢违拗他。他看着以往亲近的伴侣、臣僚、侍役以及从前的敌人，一个个从人世间消逝。连他亲生的17个儿子也大多数先他离开尘世。只有皇八子永璇（仪亲王）、皇十一子永瑆（成亲王）、皇十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二册，49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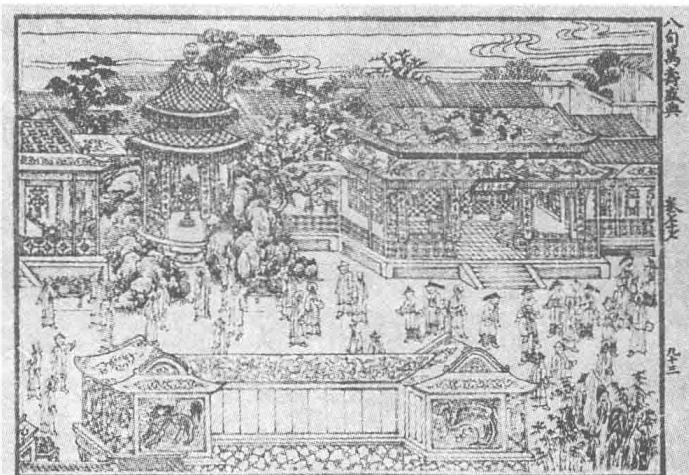


嘉庆帝御笔。

五子颙琰（嘉庆帝）、皇十七子永璘（庆亲王）还在他的身边。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他的宝座下成长、接班、任职，皇帝的周围被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占领、包围。加之他作为最高统治者，本来就不容易接触实际、了解下情。他在这个日益变得陌生的世界上更加孤寂，他遇事独断，无人可以商量，只能自思自忖，倾听自己心底的回声，越来越难以和其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据说：乾隆当太上皇时，嘉庆帝与和珅入见。乾隆闭着眼睛，仿佛已

和珅入见。乾隆闭着眼睛，仿佛已

经睡着，但口中却念念有词，也不闻是何语言。久之，乾隆忽然睁目问道：“这些人什么姓名？”嘉庆不知如何对答，和珅却应声说“高天德、苟文明”（按：此二人为当时白莲教起义的著名领袖），嘉庆听了也莫名其妙。过了几天，嘉庆“密召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云何？汝所对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诵为西域秘密咒。诵之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



乾隆帝八旬万寿盛典图。

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对也”^①。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置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聩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他。只有一个和珅还能揣摩他的一点心思。乾隆帝晚年所作诗文，词语重复，陈话连篇，流露出浓厚的自我陶醉、自我吹嘘，有时又自我忧伤、自我愤懑的气息。

二

乾隆帝即位之前，由于雍正的严刑峻法，社会和官场中弥漫着战战兢兢的紧张恐慌气氛。乾隆帝决心加以纠正，他悄悄地但又大幅度地调整政策，提出“宽严相济”的方针，要以宽大去纠正前朝的严刻。所谓“纯皇帝（即乾隆）即位，承宪皇（即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②。尽管乾隆前期改变了雍正严厉的统治方针，但其性质不超过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全盘否定前期的方针，特别是雍正时期制定的重要的、正确的政策，乾隆时基本沿袭下来，如地丁合一、耗羨归公、养廉银制度、秘密建储、军机处、改土归流、对准噶尔议和等。

“宽严相济”的方针几乎和乾隆朝的统治相始终。从根本上说，政策的“宽”或“严”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当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矛盾缓和的时候，用不着严刑峻法，社会发展任其自然，政策必趋于宽松，一旦矛盾激化，社会呈现无序和纷乱，而政府还保持着一定的权威时，就需要并能够进行严格的整顿。封建社会中不同的客观态势决定其统治政策或张或弛的节奏。乾隆帝很懂得封建的统治术，他的政策时宽时严，宽严结合，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他虽然标榜宽厚，但也经常采取极严厉的镇压手段，以消灭真正的或者只是他臆想中的危害。譬如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战败而大批诛杀大臣的风波，又如乾隆十六年

^① 易宗夔：《新世说·术解》。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